

启蒙与重建



——全球化与“国学热”张力下的中国文化

赵 林◎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启蒙与重建



——全球化与“国学热”张力下的中国文化

赵 林◎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重建:全球化与“国学热”张力下的中国文化/赵 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4832-8

I. ①启… II. ①赵…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5667 号

启 蒙 与 重 建

QIMENG YU CHONGJIAN

——全球化与“国学热”张力下的中国文化

赵 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978-7-01-014832-8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挑战与应战 / 1

一、农、牧世界的冲突与融合——全球化时代来临前的冗长序幕 / 2

二、15、16 世纪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 / 6

三、文化变革与西方崛起 / 14

四、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和悲剧结局 / 23

五、西方人的航海活动与殖民扩张 / 30

六、中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相遇与碰撞 / 36

七、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应战姿态 / 43

八、时代潮流的转变——从“泛西方化”到“非西方化” / 51

第二章 中西文化启蒙历程之反思 / 59

一、西方启蒙运动的孕育生长与剑走偏锋 / 60

二、对启蒙理性的反思——理性与信仰的协调 / 66

三、近世中国文化启蒙之滥觞 / 73

四、明末清初的启蒙涓流 / 80

五、洋务派的启蒙前奏 / 88

六、维新派的启蒙风起 / 95

七、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高潮 / 104

八、中西文化大论战 / 115	
九、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 124	
十、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 134	
第三章 当代中国文化重建路向	144
一、西风再起——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 / 145	
二、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 / 154	
三、“新左派”与“乡土”情结 / 164	
四、当代儒家的文化理想 / 173	
五、“国学热”与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 / 182	
六、“国学”的概念内涵与现代命运 / 189	
七、“国学”的时代更新和创造转化 / 196	
八、基督教的全球发展态势 / 204	
九、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文化挑战 / 212	
附录一 澳门与香港地区宗教文化状况概析	222
一、澳门地区宗教文化状况概析 / 222	
二、香港地区宗教文化状况概析 / 240	
附录二 中西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转型	258
一、中西文化的源流及其基本精神 / 260	
二、中西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 283	
后 记	306

第一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挑战与应战

当今人类无疑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21 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中。尽管关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的解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全球化时代是与“西方崛起”这一历史过程相联系的。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著名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人们通常认为 16 世纪是所谓的‘西方崛起’的开端。这个历史进程造成了欧洲现代性的关键性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欧洲各族凭借船坚炮利最终征服了其他所有的文明,建立了欧洲人的全球帝国。”^①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赖以实现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可以上溯到英国工业革命甚至更早的重商主义时代,再往上还可以追溯到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国家觊觎海外财富和传播宗教信仰的大航海时代。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化进程尽管表现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但是其最初的发轫恰恰是在近代欧洲率先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开展的——正是在 17 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架构上,一个源于“国家社会”的权力体系和组织规范、同时又不断地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国际社会才得以逐渐建立起来。而在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最终获得了合法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又可以往上追溯到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正是这场风靡欧洲的文化运动打

^①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80 页。

破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形成了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精神纽带的、“教随国定”的现代民族国家雏形。^①就此而言,15、16世纪毋庸置疑地应被视为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而在这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社会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者角色。正因为如此,全球化进程最初是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或西方化运动结伴相随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前奏曲。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来说,“全球化”这个概念首先会在心灵中引起一种屈辱的记忆,他们最初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从一个悠然自得的孤立状态强行地被推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只是在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苦难历程之后,他们才在获得了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渐以一种独立的文化身份与西方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庭抗礼。

一、农、牧世界的冲突与融合——全球化时代来临前的冗长序幕

牛津大学著名全球史专家约翰·达尔文认为,1492年和1498年“标志着欧洲新时代的开始”^②,因为在“这两个魔幻年代”,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分别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从而揭开了将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联结成一个共同体的全球化进程的序幕。而在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海外探险壮举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的衍生地——亚欧大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彼此隔绝、孤立发展的封闭状态中,只有不时发生的游牧民族的大入侵活动,才会暂时打破各文明之间的封闭状态。

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以前,人类最早出现的几个农耕文明(汤因比称

① 关于宗教改革运动对于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影响,可参见拙文:《宗教改革运动与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2011年秋季号。

②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一四〇五~二〇〇〇年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台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6页。

之为“亲代文明”)由西向东地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 35 度的狭长地带,它们分别是爱琴文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而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北面和南面,则生活着许许多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人类最初的这几个农耕文明就如同几小块酵母,处于广大的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农耕文明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而实现的——暴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方式侵略和征服文弱的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农耕世界较高水平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所同化。农耕世界的文明成果通过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逆方向地扩展到入侵者原来生活的蛮荒之地,使得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者逐渐皈依文明的农耕定居生活。农耕文明的“酵母”就这样不断地“发酵”,从而将越来越多的游牧民族融入农耕世界。在大航海活动所开启的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处于彼此隔绝状态的人类各群落就是通过这种游牧民族武力入侵——和平皈依的模式而发生相互作用的。

文明社会借助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融合而不断扩展的运动过程,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上表现出一种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是文明域界在地理上的扩展,另一方面是文明形态在历史上的更迭。其结果,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彼此隔绝的封闭状态,使人类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部相互联系的世界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嬗变与更替,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各种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①

从公元前 18 世纪到公元后 15 世纪这漫长的 3000 多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武力冲击一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从公元前 18 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6 世纪,入侵者主要是那些最初游徙于从黑海之滨到

^①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 期。

中亚草原、操持着原始印欧语言的诸游牧民族。他们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如同大海的潮汐一般,对于地处南方狭长地带上的几个“亲代文明”掀起了一次次入侵浪潮,分别对爱琴海地区、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古老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由于受到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以及喜马拉雅山脉所构成的天然屏障的保护而未受到冲击)。从时间坐标上看,这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等“亲代文明”的灭亡,然后在古老文明的废墟上氤氲化生而产生了希腊城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吠陀文明等“子代文明”形态。从空间坐标上看,这些“子代文明”的域界范围也从“亲代文明”所处的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10个纬度。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是一场由东向西的浪潮,它最初是由游牧于中国阴山和祁连山以北草原上的匈奴人推动的。这些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的不间断的南侵和西迁活动,在广阔的亚欧大草原上引发了一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在匈奴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生活在亚欧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月氏人、阿兰人、马扎尔人、日耳曼人等——纷纷被迫向西迁徙或向南转移,最终导致了对南方各个农耕文明的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的结果,在文明形态上由东向西分别促成了中国秦汉帝国、中亚大夏王朝、西亚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埃及文明的灭亡和印度笈多王朝的衰落,并且在这些旧文明的废墟上又产生了更新一代的文明形态,如中国的唐宋文明、从中亚一直到北非的阿拉伯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包括西欧的天主教社会和东欧的拜占庭文明)等。在地域范围上,由于匈奴人、鲜卑人、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日耳曼诸部族、阿拉伯人等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纷纷接受了后者的文明,从而使得从波罗的海到北非,从黑海南岸到阿拉伯半岛,从祁连山到孟加拉湾的广大区域都被纳入农耕文明的范围之内,文明社会的域界又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20多个纬度。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主要来自蒙古人和突厥人,它来

势凶猛、覆盖面广但却为时较短(起于13世纪,到14世纪时已经接近尾声)。在这次席卷整个亚欧大陆的大入侵活动中,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从东亚一直到东欧的广大范围内,建立了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四大汗国和中国的元朝,对于这些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和颠覆。但是,蒙古人和突厥人并没有改变所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相反,大多数野蛮的入侵者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放弃了传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而皈依了流行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与前两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的历史后果不同,“蒙古人并未能制造出一个独特的、持久的文明。他们的征服毋宁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①。但是这次大冲击却使更多的民族和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的范围。

蒙古人的征服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击运动,“自此而后,历经3000多年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游牧世界各族在入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旦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各自农耕化或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入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迁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②随着草原日益转化为桑田,文明的农耕世界也不断地借助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反作用力,通过“以夏变夷”的教化方式把游牧世界从地图上一点一点地抹掉。乃至到了15世纪以后,零星分散的游牧民族再也不可能对实力雄厚的农耕世界构成威胁,它已经不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世界”存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持续了3000年之久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就逐渐让位于农耕世界与它自身中所孕育的工业世界之间的矛盾。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这种矛盾典型地表现为西方新兴的工业文明与仍然停留在传统自然经济状态中的东方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具体地说,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耕文明的征服和影响。只是从这时起,世界上的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才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毛昭晰、刘家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9页。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1页。

真正地被联系到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之中,全球化历程也由此开始启动。

从这种发展的世界史观来看,3000多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融合只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历程的一部冗长的序幕,15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内部的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变革以及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才逐渐将彼此分散隔绝的国别史和区域史纳入统一的全球化历程之中。

二、15、16 世纪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

公元1370年以后,作为成吉思汗女系后裔的帖木儿在察合台汗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突厥帝国。这位曾经在战斗中由于箭伤而跛了一条腿的“世界征服者”一心想重振先祖成吉思汗的雄风,他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都城,向西吞并了地处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向北打败了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向南征服了印度的德里。不久以后,他又在安卡拉打败了刚刚崛起的土耳其人,生擒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一世。1405年,当踌躇满志的帖木儿率领20万大军准备向东对中国明朝发起攻击时,这位年逾七旬的征服者终因不堪军旅劳顿而病卒于进军途中。帖木儿死后,他的突厥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也至此画下了句号。帖木儿帝国的昙花一现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约翰·达尔文对帖木儿之死的意义评论道:

事实上,帖木儿之死,在几个方面标志着全球历史上一个漫长阶段的终结。首先,整个欧亚世界由远西诸国、信仰伊斯兰的中欧亚、儒家文化的东亚这三大势力盘踞,而他的帝国,乃是最后一个欲打破这分割态势的壮举。其次,他的政治实验和最终失败,说明权力已开始由游牧帝国转回定居国家之手。再次,帖木儿对中欧亚所造成的间接伤害,还有部落社会在该地区所继续拥有的过大影响力,均间接促成(即使是渐渐促成)欧亚世界的权力重心转而落在远东和远西,而中欧亚则成为此过程的牺牲品。最后,他去世时,既有的长程贸易模式、他生前亟欲掌控的东西贸易路线,同时开始有了改变。他死后只数十年,以撒马

尔罕为中枢统治世界的帝国,就已成为荒诞不经的想法。在全人类四通八达的海洋上发现航路,使人类得以前往世界各地,从而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情势。^①

由此可见,帖木儿之死不仅意味着建立统一的世界大帝国的宏伟理想灰飞烟灭,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长达 3000 多年的大入侵浪潮终告结束,亚欧大陆上已经羽毛丰满的基督教文明(远西诸国)、伊斯兰教文明(亚欧大陆中部诸国)、儒家文明(东亚的明朝)等定居的农耕世界又重新掌握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权力,而且还间接地导致了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路线——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和海上贸易路线的兴盛,以及远西(西欧诸国)和远东(中国)在未来世纪里的权重剧增。

当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开始对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进行攻击时,基督教信仰(包括西欧的天主教信仰和东欧的东正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和儒家伦理早已分别在欧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北印度)、中国等地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这三个地区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精神根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短暂入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欧大陆这种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更没有撼动这些根深蒂固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对于各大文明地区的深刻影响。而且那些剽悍的游牧入侵者一旦在他们所征服的地区定居下来之后,很快就皈依了当地的宗教,融入具有更高势能的农耕文明中。因此,当帖木儿帝国瓦解之后,亚欧大陆又重新回到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之中。

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之中,亚欧大陆中部地区一度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实力中心,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帖木儿帝国都建立在这个地区。帖木儿在进攻中国之前曾经对亚欧中部的伊斯兰教国家大肆攻掠,1400 年突厥人重创马穆鲁克王朝(奴隶王朝)的军队,攻占了大马士革;第二年,突厥人又洗劫了巴格达,据说帖木儿用 9 万个巴格达居民的头骨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座

^①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一四〇五~二〇〇〇年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台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35~36 页。

高塔。1402年帖木儿在小亚细亚打败了奥斯曼帝国,俘虏了其国王并将他折磨致死。然而帖木儿死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又重新在西亚、中亚和北印度地区崛起。15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在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了三个主要的伊斯兰教王国。它们分别是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什叶派信徒在伊朗建立的萨非王朝,以及帖木儿的后裔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

在这三个伊斯兰教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最为强大。这个1299年才在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最西端出现的蕞尔小国,在其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迅猛膨胀,发展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超级大国。实际上,早在1354年,土耳其人就已经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而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了立足点。到了14世纪末叶,他们已经占领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地盘,君士坦丁堡成为了一座孤城。15世纪初帖木儿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只不过是延缓了东罗马帝国毁灭的时间罢了。到了1453年,土耳其人终于攻占了屹立在亚欧大陆接壤处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了这个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的古老帝国。到了17世纪末叶,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达到极盛状态,把整个小亚细亚和西亚、黑海周边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以及埃及和北非地区全部囊括在内,并且不断地对西欧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发起攻击,直到1683年还最后一次围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虽然奥斯曼帝国由于用力过猛而致使后劲不足,在18世纪以后逐渐被相继崛起的西欧列强和俄罗斯所分割蚕食,但是在帖木儿死后的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对西欧基督教世界保持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势。斯塔夫里阿诺斯描写道:“奥斯曼帝国在其臻于鼎盛时的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地跨三大洲,拥有5000万人口,而那时英国却只有500万人口。无怪乎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一团日益旺盛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会把它熔化,并继续燃烧下去’。”^①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劲势头相比,15、16 世纪的中国明朝在综合国力方面丝毫不遑相让,而且由于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性,所以其经济和文化显得更加繁荣昌盛。只是由于地理环境方面的限制,再加上传统的“夏夷之防”观念的影响,所以明朝时期的中国人对于向外扩张的兴趣不大,而是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蜃景之中,关起国门来自得其乐。

1279 年忽必烈治下的元朝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在其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蒙古统治者虽然也采用了一些“汉法”,但是对于儒家文化基本上持一种贬抑态度。元朝时“民分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广义的西域人)、汉人(淮河以北原金国治下的人民)、南人(南宋子民),其中传承中国儒家文化之精粹的南人其社会地位最低下。忽必烈曾一度下令废除了自隋朝以来一脉相承的科举制度,后来元仁宗虽然又予以恢复,并把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确定为科举命题释义的基本规范,但是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对于儒家思想并不重视。当时民间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足见儒生地位之卑微(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即源于此说)。蒙古人既然是游牧民族,马背上得天下,也试图马背上治天下。他们既为“夷狄之人”,自然对中国商、周以降在汉人中流行的“夏夷之防”观念不屑一顾,对于儒家的纲纪伦常也不为以然,而是志在通过武力建立一个种族混杂、兼收并蓄的草原大帝国。因此,当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而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明朝之后,为了确立朱姓江山在政统和道统上的合法性,就必须重新高扬起儒家的旗帜。^① 由于明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和“君臣父子”的纲纪伦常再度得以弘扬光大。以程朱理学为典范的儒家伦理深深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成为民间宗法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规范,而且通过不断完善科举制度与官宦权力系统相结合,成为明朝专制主义政治的重要思想根基。虽然明朝的皇帝们对待儒家知识分子

① 朱元璋早年曾因家境贫寒而剃发为僧,后来加入白莲教主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红巾军抗元起义,因此其最初的文化根基是佛教和白莲教等民间宗教。但是当他掌握了政权之后,深知要想长治久安,还须借重儒家的思想资源,故而在登基伊始就诏令天下:“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明史》卷二,第 15 页)

(士大夫)的态度不像宋朝君主那样宽厚^①,但是儒家伦理却成为集权政治的驯服工具,不仅为明朝的专制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据,而且也对明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同样遭到蒙古人征服的中亚、西亚和北印度地区不同,而且也与欧洲的情况相异,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特色就是大一统性,它不像伊斯兰教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那样分裂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集团或封建领地,而是基本上保持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性使得朝廷可以高效率地动员整个社会的人口资源和国土资源,从而有效地抵御(或同化)外族入侵和推动经济发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的大一统特点又与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中的独尊地位密切相关,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及其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②在明朝,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也由于儒学的复兴而得到了思想上的强化。因此,明朝时候的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加强了专制统治,而且也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也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

宋、明两朝素来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繁荣的时代。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永乐皇帝)开始,就一改朱元璋贬抑商业和限制外贸的政策,大力推动海外贸易,从而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在中国国内,商品经济不仅已经萌芽,而且在明朝中叶(16世纪)发展到了相当规模。许多种田人转农为商,一些读书人也“弃儒入贾”。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出现了“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覈”,“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情景。^③一批新兴的商贾市镇在江、浙、闽、广等地迅速

① 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皇帝往往与儒家知识分子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共定国是”和“共治天下”,而且“百年未尝诛杀大臣”;然而明代自朱元璋开始,“士”往往只是为皇帝所使用的统治工具而已,稍有不慎,即会遭受朝廷的诛戮和廷仗之辱。参见余英时:《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载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页。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崛起,许多以血缘和乡谊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江西商帮等不断壮大。全国性的商品经济已经形成气候,“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①纸钞、白银、铜钱等通货在全国流行,钱庄、银票、会票和银钱兑换业务也在一些商业市镇中普遍出现。“到了1487年,一位官员写道,人们‘把谷物换成金钱,然后再把金钱换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如此’。”^②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所以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才得以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将实物、劳役赋税一律货币化。这种改革举措反过来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约翰·达尔文一方面对明朝中国社会的繁荣昌盛景象大加赞美:“中国朝廷的威仪堂皇,中国城市的富裕繁荣,中国工程师和工匠的本事高超,中国消费品(例如,丝、茶、瓷)的品质优良,中国艺术与文学的深奥微妙,儒学的思想魅力,广受东亚、东南亚的钦羨推崇。”另一方面却认为明朝的经济只是在“量上有所成长,质却未提升”,而且与宋代相比已经“陷入某种技术停滞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明朝在15世纪中叶以后放弃海洋而陷入自我封闭状态所致。因此,尽管明朝时的中国已经达到“高度均衡状态”,达到“经济成就的高峰”,但是却失去了向上攀升的动力,“高度均衡状态反倒成为困境”^③。然而,就在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由于繁盛均衡而故步自封的时候,地处远西的欧洲却由于贫穷落后而开始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变革。

在15、16世纪,与亚欧中部虎视眈眈的伊斯兰教文明以及东亚繁荣昌盛的儒家文明相比,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状况的确可谓令人沮丧的。当时的西方人除了在奥斯曼帝国咄咄逼人的气焰面前深感不安之外,也对马

① 李鼎:《李长卿集》卷二。

②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③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一四〇五~二〇〇〇年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台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9~71页。

可·波罗等 13 世纪以来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东方国家(中国、印度)的富饶景象仰慕不已。如果撇开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一个生活在 1500 年前后的西欧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武力威逼和东方国家的财富诱惑面前必定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惭形秽之感,抱怨自己不幸生在了欧洲。美国耶鲁大学的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对当时的情况描述道:

众多学者以 1500 年作为近代和近代前的历史分期线,而在当时,欧洲的居民还根本没有认清,欧洲势将主宰世界上其他大部地区。当时关于伟大的东方文明的知识全以旅行者所述见闻为依据;叙述真中有假辗转流传,真假巨细无遗,既失于支离破碎,又往往谬误百出。然而,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无比富庶、军力强大、幅员辽阔的那些东方帝国形象却是相当准确的;而且,乍听之下,认为东方社会同西欧各民族和国家相比,必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①

当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终于从蒙古人入侵的“黄祸”威胁下解脱出来时,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宁。帖木儿帝国虽然瓦解了,但是另一支突厥民族——土耳其人却在亚欧大陆接壤处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并且在迅猛扩张的过程中对基督教欧洲形成了新一轮的压力。从内部的情况来看,15 世纪的西欧社会仍然处于闭塞落后的封建状况之中,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蒙昧。1417 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结束了西方教会大分裂的时代,罗马天主教廷又重新跃居上权力的峰巅,一方面通过宗教裁判所来加强思想专制,打击一切可能威胁到罗马教皇和大公教会的权威性的“异端”(例如,对英国宗教改革先驱威克利夫的谴责和对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的迫害);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打着拯救灵魂的神圣大旗来攫取世俗利益(例如,兜售赎罪券的活动)。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天津编译中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